

开发商送礼名单击中吃拿卡要潜规则

欣城 教师

近日，网友雨声称路边捡到一个U盘，引来公众广泛关注。在该网友爆料的《银川通城置业地产公司春节送礼名单》图片中，上到宁夏中卫市副市长下至中卫农信社主任，共涉及20个政府职能部门，47名政府官员位列其中。礼品是储值卡、购物卡等，而备注中却标明“卫生许可证”、“办理各类证件”等送礼用途。中卫市纪委称确有其事、卡片正在回收，具体情况不便透露。（7月3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中纪委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当口，却传来地产公司给47名领导送储值卡、购物卡的消息，如此爆料引发公众围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尽管地产公司辩称，送卡是为“触动消费”，是“营销策略”，但值得追问的是，开发商为何专门向领导送卡，不向普通市民送卡？为何卡片备注里还标明“送礼用途”？储

值卡、购物卡对应着真金白银，又该作何解释？企业此番辩解不仅不能消除公众疑问，只会越描越黑。

笔者注意到，中卫市纪委表态确有其事，并称卡片正在回收。官员收受企业礼品被举报，纪检部门不查处、不问责，仅仅只是回收卡片了事，官员收受开发商礼品完全是零风险、零代价，如何以儆效尤，又如何令人信服？从网友曝光的情况来看，开发商送礼名单包括中卫市两名市长与秘书长等重量级人物，中卫市纪委查处中卫市长能查出个壬子丑卯吗？因此，要还原地产公司送礼事实真相，中卫市纪委不妨主动避嫌，改由上级纪检部门介入，将更具有说服力。

从媒体披露的一些官场潜规则来看，官员与企业主勾肩搭背，商家节假日“慰问”官员早已成了见怪不怪的风景。此前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退贿清单”就是佐证。一个个性特立独行，职务不高，根本不愿收礼的小官员春节期间都会收到6笔礼

金。作为地产公司这样有求于职能部门的企业，在春节之际“慰问”各路“神仙”并不难理解。

该新闻揭示出的官场送礼潜规则更是不可小视。现实生活中，企业、商家遭遇官场潜规则并非个案。今天说你管理不规范，明天要求送干股，后天举行“鸿门宴”，官僚作风严重，对企业、商家“吃拿卡要”，诱导甚至逼迫企业、商家送礼、公关的官员不在少数。

此前曝光的天邦达成都公司中秋国庆双节客户慰问明细表、深圳万泽地产送礼清单，与银川这家地产公司春节送礼名单如出一辙。再往前追溯，民营小企业湘连公司《请客送礼日记》的案例更为典型。湖南娄底市纪委查明，送礼日记基本属实，共查出38名存在问题的涉案人员。然而，在纪委介入查处后，不仅大部分涉案人员未受处理，举报人公司经营步履维艰，处处遭遇打击、报复。还有干部宣称：“现在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送礼无法回避。”娄底市纪委

奈何不了送礼日记，中卫市纪委又如何查得了市长大名赫然在目的送礼清单？

送礼潜规则不仅增加了企业负担，影响了投资环境，还破坏了政府形象。而且企业遭遇潜规则，还扯出了行政审批过多过滥的问题。尽管中央多次要求“简政放权”，但是效果并不乐观。对此，有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部门增加企业办事难度，就是借此向企业要钱，为部门与个人开财源。”地产公司送礼清单不过是冰山一角。

进一步说，“简政放权”会压缩官员的权力空间，触动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在现行体制下，官员与企业之间权力、地位不对称，企业有求于官员。除了体制弊端外，腐败潜规则不可小视。有的职能部门不是“简政放权”而是争相“揽事揽权”，人为增加企业办事难度。有的官员权力利益情结根深蒂固，根本不甘心接受“简政放权”、打造服务型政府的现实。

今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的周伯华透露，今后创业不再有门槛。政

府从理论上降低创业门槛相对容易，而打破吃拿卡要潜规则，创造宽松的创业环境，不能寄希望于公务人员良心发现。改革绩效评价机制，清理职能部门无形的吃拿卡要潜规则很重要。如果企业、创业者对职能部门拥有评价话语权，且评价意见影响到公务人员绩效考核，如果公务人员的违法成本远高于守法成本，吃拿卡要者被扒掉官帽、饭碗，送礼潜规则才可能逐步被打破。



企业如何适应“李克强经济学”

赵建 企业高管

让我们忐忑不安的那只“无形的手”终于真正伸了出来，新一届政府的理政思路，对企业来说，无异于“一场风暴”的前夜。如果这时企业仍然还处在懵懂的状态，那么等到企业灰飞烟灭的那一天，或许才会在忏悔中自责。

很少有人会思考：这么多年来，国有企业到底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中生存？那么多人张口闭口就是“市场”、“竞争”，而实际上却只是穿着“皇帝的新衣”，因为国有企业从未经历真正的市场，那么多光鲜的“口号”和“文化”却因为自己没有真正弄懂显得认真而滑稽。

我们看到，这么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一是依靠政府投资，二是人口红利，三是改革红利，四是透支生态。而国有企业处在利益固化的阶层，被国家抱着、哄着“茁壮”成长。

然而，我们看到李克强时代的改革已经转变为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进入了依靠利益分配引导资源配置的时代。回过头来看，经过连续不断的高额投资，建筑行业迅速膨胀，中国铁工、中国铁建等建筑巨头的世界排名直线攀升，新挤进的企业如雨后春笋。今天，中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逐渐进入成熟末期，如此巨大的过剩产能只能导致剧烈的价格博弈。

那么企业还能等待国家“救市”吗？新出台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了“简政放权”的主导思想，取消了133项审批权，政府不再扮演“奶妈”的角色，把市场的功能还给市场。

“李克强经济学”标志着真正的“市场经济时代”开始了！

或许这时一些人才会清醒，企业高举了这么多年的“市场”其实并未经历，喊了那么多年的“管理”其实还在原地踏步。今天，政府的任务就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

府，政府不是代替市场中的主体去创造财富，而是创造市场赖以运行的环境。

建筑行业面临的现实是极为残酷的，对过剩产能，政府的态度是“遏制”，处在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将在市场的调整中，一部分将消失，一部分被兼并重组。而真正有生命的企业将顺利实现“转型”。

那么如何转型？“强刺激”的经济时代决不会重演，经济已步入市场轨道。今天，政府明确提出支持“科技型、成长型、出口型企业”的发展，建筑行业也将会逐渐走出“关系市场”的阴霾，而企业唯一正确的方向是进入产业链的高端，也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活。只有“初中水平”的企业不要再不懂装懂，多学些真本事，脱离靠“骂娘管理”的大老粗状态；只会“干粗活”的企业要琢磨搞点“发明创造”，弄一些别人不会的玩意儿。

“适者生存”是市场经济的金斧头，也是“李克强经济学”对企业的沉重期待。

成本100元的“洋奶粉”何以卖到800元？

刘鹏 职员

7月2日，国家发改委披露，已掌握了部分“洋奶粉”经营企业违法操纵、抬高奶粉价格的证据。对此，乳业专家宋亮称，自从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以来，消费者一直对国产奶粉持不信任态度，各大进口品牌包括部分本国进口奶粉企业利用消费者的不理性心理，达成默契，每年轮流坐庄哄抬婴幼儿奶粉价格，给国内消费者带来很大负担。比如一些“洋奶粉”成本100元，却卖出800元的高价。（7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

此前，国内一些品牌奶粉很“坑爹”，其用种种质量问题，损害着消费者的健康和利益。为了自保，消费者将眼光投向了“洋奶粉”。然而，100元的“洋奶粉”卖到了800元，无疑让“洋奶粉”也成了典型的“坑爹”者。特别是在国内消费者将信任都给予了“洋奶粉”时，其却故意违法哄抬价格，實在是让人失望与错愕，也无法容忍。

一些“洋奶粉”用高价谋取暴利，甚至违法垄断，进行不正当竞争，无疑是其本身逐利冲动大过了良知与法律意识的结果。按道理来说，国内品牌奶粉频频失信于消费者，甚至坑害消费者，消费者对其失去了耐心和信任，这确实是“洋奶粉”的机会。如果恪守本份，严格遵守市场经济规则、遵守法律法规，用质量和品质赢得消费者的信赖，未必不是“洋奶粉”占有市场、赚取利润的好办法。然而可惜的是，一些“洋奶粉”经营者同样过于短视，在短期利润的驱使下，竟然无视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无视市场经济规律和原则，甚至视法律为无物，有意轮流坐庄哄抬婴幼儿奶粉价格，于情、于理、于法而言，这种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和惩处。

成本100元的“洋奶粉”卖到800元，经营者挑战市场与法律底线，必定会受到市场与法律的惩罚。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洋奶粉”的“痼疾”，从很大程度上

来说，正是国内消费者和乳企惯的。“洋奶粉”之所以很“牛”，底气十足地涨价，与消费者的不理性消费需求有关，但更是国内品牌奶粉“不争气”的必然。“洋奶粉”暴利坑民，不正常竞争和违法违规哄抬价格，敲响的，正是国内乳企有待提升产品质量和品质、改善企业形象与品牌信誉的警钟！

从本质上而言，“洋奶粉”在国内品牌奶粉乱象中，进一步制造混乱，是乘人之危，是发行业灾难财甚至是国难财。因此，一方面，我们对一些“洋奶粉”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给予重罚与严惩；更重要的地方在于，要加强对国内乳企的管理，让国内品牌奶粉用质量说话、用品质说话，尽快树立起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形象和信誉，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也唯有让“洋奶粉”不再是消费者追逐与迷信的对象，方才有望避免其用暴利“坑爹”。的理财渠道，自己在理财的过程中也就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余额宝”存款业务的推出，马上被业界视为阿里巴巴与银行的一种竞争，这无疑也会在客观上给银行业以压力，进而把经营与服务做得更好，最后受益的还是公众以及国家整个的金融业大环境。也许几年之后，公众手里再有闲钱，就会思量着是把钱存到银行呢，还是存到淘宝呢？

但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以上这些只能算是网络理财的一种“发展前景”，还远远不是事实。实际上对绝大多数淘宝客户来说，目前还只是把淘宝账户里面的余额参与“余额宝”的理财，而不是把家里的或者是银

所以承诺，如果客户账户余额资金被盗，支付宝方面将全额赔偿。但只有赔偿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一旦失窃事件太多，支付宝无力承担，显然会影响业务的发展。

说到底，我们当然希望网络理财能够发展壮大，但是它最终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需要时间的检验。

私募债：要积极扶持更要强化管理

邓昌发 自由撰稿人

日前，《东莞市扶持中小企业发行私募债暂行办法》正式出炉，这距市政府常务会议同意市财政扶持中小企业发行私募债后尚不到一个月时间。根据操作规程，市财政将对前10家首次成功发行私募债的中小企业，首年按发行额的2%给予贴息支持，每家企业补贴额度不超过50万元。（7月2日《东莞日报》）

于中国而言，私募债可谓一个新鲜玩意，它属于公司债的一种，是非上市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通过承销商向特定投资人定向发行的债券，其显著特点是高风险、高收益、灵活性强。当前，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现象较为普遍，迫切需要丰富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此背景下，经证监会研究同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去年5月分别发布实施《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试点办法》。

文件出台后，不少人认为私募债的合法化将给中小企业更多行之有效的融资渠道，从而取代对传统银行贷款业务的依赖性，免受诸多限制。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私募债承销试点一周年之后，尽管从最初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和浙江6省市试点，扩大到眼下的十四省五市，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发展却并不如预想中顺利，经过了短暂的“一难难求”

后，这一创新产品俨然正沦为资本市场的“鸡肋”，参与者寥寥，上市速度逐步放缓。究其主因，并不复杂。目前私募债的年化利率基本都在10%以上，私募债成本不可谓不高，且私募债的风险也相对较高，无论是对于机构投资者还是企业，风险和收益都很难匹配。

此语境下，东莞市政府出台的支持企业私募债发行的办法，无疑对引导企业发行私募债有一定积极作用。一方面，在对企业给予贴息支持后，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发行私募债的成本，增加发行信心；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出台扶持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政策的城市并不多，尤其是今年以来，市场上陆续出现了个别像超日信用债违约的案例，给市场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此时，企业一旦获得政府层面的支持，显然有利于尽可能消除人们对私募债会不会赖账的担忧。

仍得提醒的是，因为中小企业规模小不稳定因素多、抵御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等原因，决定了市场各方乃至政府对私募债都要有清醒认识，不能盲目乐观。它一方面需要继续完善法律体系、信用评级体系、信息披露制度等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也需要职能部门切实加强了对证券公司等市场参与主体的监督管理，以规避各种风险和问题的出现。只有做好这些方面，才能真正发挥私募债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的强大功效，也才有望为资本市场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国企利润分配改革要多管齐下

叶祝颐 教师

国企上缴利润太低，一直备受诟病。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日前审议2012年中央决算报告时，彭森委员提出，去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收入有2.1万亿，通过国有资本预算，能够集中收上来体现在财政收入中的只有900亿元左右，比例不到5%，这个钱主要还用于整个国有企业的再投入。吴晓灵委员也提到，上缴来的利润90%又返回到国有企业中去使用。（6月30日，《海峡都市报》）

花纳税人的钱建设的国有企业并非民营公司，每一个国民股东都有权对国企的利润流向充满关切、提出质疑。从团购门到茅台门，有关国企的负面消息不断传来，公共资金投资建设的国企盈利的，却被用来买茅台、洋酒，为内部员工团购福利房，为少数人谋利益。国有企业的利润高达2.1万亿元，而国企上缴利润只有900亿元左右，这个比例不到利润总额的5%。就是这上缴的900亿元又有90%返回到国企上使用。也就是说，国企实际上缴利润只有90亿元左右。相对于国企的2.1万亿元利润而言，国企拿这么一点钱反哺社会，莫非是

打发叫花子？九成上缴利润最终返回国企，让广大国民股东情何以堪？

坊间要求国企说明超额利润流向、提高利润上缴比例的呼声十分强烈。但是国企利润如此内循环，国民股东自然有话要说。针对国有资本收益比例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曾直言：“利润上缴比例即便提高10个百分点，对国企来说是九牛一毛，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这为提高央企上缴利润比例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那么，国企利润到底应该如何分配呢？企业扩大再生产，支付改革成本，搞科技创新，支付员工工资福利，企业公务消费等项目都需要钱。当然，国企还可以罗列很多理由，国企董事也会向股东说明利润使用情况。但是国企利润到底如何分配，除了董事会与企业高管以外，国民股东根本没有知情权。更遑论发言权。运用公共财政资金投资建设的国企盈利了，广大纳税人不知道利润流向，无权发表利润分配意见，分不到国企利润成果，岂不滑稽？而且不少国企在收获垄断利润的同时，还伸手向财政要补贴，左右着资源产品、民生产品的定价大权。

尽管国企可以百般辩解，但是，公众舆论一直诟病的企业腐败、高管天价年薪、员工高福利、产品高成本、高价格，奢侈公务消费等央企积弊，事实上已经揭开了国企利润流向不明朗、不合理的体制病灶。督促国企说明超额利润流向，拿出更多利润还利于民，仍需法律制度持续给力。

除了提高央企利润上交比例这条路径以外，依照《反垄断法》的要求，降低民间资本投入门槛，激活市场竞争，让消费者与经营者在合法市场框架内充分博弈，依靠市场力量逐步打破央企“一企独大”的垄断局面。更为重要。

在部分国企特别是央企垄断地位暂时无法打破的现实语境下，一方面，审计部门要完善审计监督，增加国企产品生产运营成本、定价与员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工资福利支出的透明性，让高管高薪、员工高福利，主动接受公正检验与公众监督。另一方面，国企公务消费支出，腐败浪费等问题也应该得到约束与规范。

在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督促国有企业补上社会责任课，主动向国家分红，遏制频繁涨价的利益冲动，降低产品价格让利于民，不做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治理违建高尔夫球场岂能以罚代管？

胡艺 职员

湖南张家界市的两个高尔夫球场正打着体育公园、休闲公园的招牌规划建设。由于当地政府恃权，国土资源部门对其做出处罚后，仍建议“尽快对该项目补办用地手续。”张家界市城管局副局长龚厚钦说，没有高尔夫，张家界这个旅游城市的品位就上不去，我们必须打擦边球，以体育公园的名义，先上车，后买票，买不到票也没有关系。要求下面部门强力推进。（6月30日《京华时报》）

早在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叫停了新高尔夫球场建设。此后中央针对建设高尔夫球场的禁令一个接一个。张家界市以体育公园的名义推进高尔夫项目，乱打政策擦边球，这不是顶风作案吗？虽说国土部门给违建球场作出了处罚，当地因兴建高尔夫球场拆迁还引发了自焚事件，但是张家界市高尔夫球场项目（而且是两个）依然高调推进，国土资源部还建议“尽快补办用地手续。”执法严肃性何在？政府公信力何在？

不仅是张家界，违建建设高尔夫球场的现象比较普遍。统计显示，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时，全国大约有170家高尔夫球场。到2010年底，全国高尔夫球场已达

600多家，这还不包括正在兴建的高尔夫球场。这些新增高尔夫球场显然就是违规建设的。据业内人士介绍，各地违法占地、违建建设高尔夫球场有从沿海向内地蔓延的趋势，规模也越来越大。

中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据介绍，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每天用水量在2000至2500立方米。不少高尔夫球场为了保持茵茵绿草，不断抽取地下水灌溉草坪，导致地下水被严重超采。我国水资源本来就十分紧张，地下水本来就因生产生活需要被超采，违建高尔夫球场再大量攫取地下水，不仅打破了水资源平衡，而且可能给子孙后代带来“天底之灾”！地处湘西山区的张家界，水源从何而来自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说高尔夫球场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地方形象，抬高周边地价、房价，给官员带来政绩光环。但是，地方不能违背国家土地制度与节能政策。在资源紧张警报一再拉响的当下，地方没有理由放任违建高尔夫球场“吞水吃地”。

如果百姓生活困顿，水资源紧张，哪有心情欣赏高尔夫球吗？何况，高尔夫球场属于消费昂贵的贵族运动，在某些地方高尔夫球场俨然成了富人的后花园。地方牺牲广大民众福祉去打造形象工程，迎合少数人的消费需求，显然难以

服众。“民生优先”常常挂在某些官员的嘴边，为何光说不练？土地被占用，地下水被超采，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哪里？

不仅张家界不能“打擦边球”违规兴建高尔夫项目，其他地方也不能以兴建生态公园、体育公园等名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建设高尔夫球场。所有浪费资源、牺牲民生利益的形象工程都让人感到刺眼。放慢上形象工程的步伐，把打造形象工程的热情转移到民生工程上来，才是发展的正解。

有的地方为何热衷打造透支生态资源的形象工程呢？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地方根本没有尊重民意的习惯。虽然百姓对“吞水吃地”的高尔夫球场脚投票，但是高尔夫产业给地方带来面子风光与地价、房价上涨的暴利，造成发展幻觉。

而且，打造形象工程并非一己独有的风景，从穷县打造一流亮化工程，到高尔夫球场建设一哄而起。由于问责乏力、法不责众，形象工程伤民的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家明令禁止新建高尔夫球场，而高尔夫球场建设热成了公开的秘密，就颇能说明问题。相关部门提高高尔夫禁令执行力，拿出壮士断腕之勇清理违规高尔夫项目，收回土地、恢复生态，对高尔夫项目建设者启动处罚程序，对执法不作为者与高尔夫项目背后的毕姥爷启动问责程序，势在必行。